

现代作家 见闻录

XIANDAI
ZUOJIA
JIANWENLU

杨希之◎著

刘白羽

林默涵

夏衍

艾青

臧克家

方敬

魏巍

曹禹

欧阳山

秦牧

碧野

吴祖光

.....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现代作家见闻录

A chronicle
of
Modern writers

杨希之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作家见闻录 / 杨希之著 .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 2019.9
ISBN 978-7-229-14457-9

I . ①现… II . ①杨… III .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13704 号

现代作家见闻录

XIANDAI ZUOJIA JIANWENLU

杨希之 著

责任编辑：李云伟

责任校对：李小君

装帧设计：白一岑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豪森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mm×1092 mm 1/16 印张：11.75 字数：150 千

2020 年 8 月第 1 版 202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14457-9

定价：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充满激情的散文家刘白羽	/001
敦厚谦和的文艺理论家林默涵	/009
我们的总顾问：夏衍和阳翰笙	/016
与大诗人艾青的三次接触	/024
“乡土诗人”臧克家	/029
学者型作家方敬	/034
“七月诗人”邹荻帆、绿原	/040
诗人、剧作家阮章竞	/046
“文学界的世纪老人”楼适夷	/051
温和忠厚的老作家艾芜	/056
不愿参加会议的作家吴组缃	/060
喜爱写毛笔字的作家周而复	/064
“东北作家”骆宾基	/069
军旅作家魏巍	/076
解放区走出来的小说家康濯	/081
令人心生敬意的小说家王火	/087

充满激情的散文家刘白羽

刘白羽既是一个卓越的散文家，同时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小说家。他 1936 年踏入文坛就是从小说创作开始的，而且，他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还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散文家。这不仅是因为刘白羽是以散文闻名于世的，比如他的散文《长江三日》、《日出》、《红玛瑙》等就颇为很多人喜爱，而且因为见到他本人以后，更被他身上的散文家气质所打动，觉得像他这样的感情奔放的人就该是一个卓越的散文家。

在 1987—1995 年，我因为参加了重庆出版社三套抗战系列书系的编辑工作，而刘白羽则是这三套书系的编委或总主编，所以，我有幸多次听到刘白羽激情洋溢的讲话。

我第一次见到刘白羽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编纂工作座谈会上。座谈会在北京四川饭店举行。当时，6 月下旬的北京已经有些炎热了，很多作家都是穿着短袖衬衫来参加会议，而刘白羽却穿着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进入会场。他身材魁梧，腰板挺直，步态稳健，俨然一副军人的气质。由于参加会议的人较多，大家的发言都不长。刘白羽的讲话虽然也很短，但他说话声音洪亮，带有胸音，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比较中听，同时他说话又是抑扬顿挫，重点突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首先表示支持出版这套书，然后重点谈到武汉时期的抗战文学。

他说：“武汉这一段时间不长，但很重要。艾青的《火把》、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我当时在武汉，成立‘文协’时我也在武汉。”这段话言简意赅，既强调了武汉抗战文学的重要性，又突出表明了自己的大后方作家的身份。刘白羽在抗战时期大部分时间在解放区生活，属解放区作家，在这样的会上他必须强调自己的大后方作家的身份，尤其是武汉这一段经历（在重庆那一段经历，大家都知道，所以他略而不谈），不然就会名不正言不顺。这也体现出了刘白羽的说话技巧。

刘白羽讲话往往不喜欢面面俱到，而是突出重点，淋漓尽致地讲述自己的观点或抒发自己的情感。在1988年3月29日举行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编委扩大会议上，他就重点谈了大后方文学的选编标准问题。他说：“我很赞成出这套书。这套书的选编标准最高的就是爱国主义。只要掌握住这一点，就好了。我到美国去，看到美国的老朋友，他们对抗战这段历史是念念不忘。看见海伦·斯诺，她谈到这段时间，很激动啊！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这段历史是重要的，要写。我们的民族很伟大。要成为一个强国，要有这样的志气才行。所以我赞成出这套书，因为这是对提高文化素养、培养爱国主义的贡献，对民族的贡献，对子孙后代的贡献。”刘白羽这段简短的发言高屋建瓴地强调了抗战文学爱国主义的特点，并上升到培养爱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高度说出了出版这套书的意义。他的这段讲话不仅抓住了爱国主义这个重点，而且表现了他讲话激情洋溢的特点。

但真正体现刘白羽讲话风格的要数在1989年7月举行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当时，刘白羽满怀激情地即兴讲了二十来分钟。他动情地说：“我们几千万烈士牺牲流血才换得这么一个国家。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志参加了，我也很荣幸地参加了第一个‘十月一号’。我还记得十月一号的前一天的傍晚，建立英雄

纪念碑奠基典礼时那个庄严的情景，我还记得当时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把五星红旗定为我们国家的国旗的情景，我还记得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情景。那个时候，我们是多么高兴啊！当时，我看到一个同志，就是杨刚同志，她泪流满面，我也泪流满面。我们觉得我们无愧于我们那些牺牲的同志，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得到安息了，我们的人民站立起来了，我们的五星红旗飘扬起来了。我们就是这样热爱我们的国家。”刘白羽说得是那样的充满激情，仿佛是在朗诵一段抒情散文。他的声音微微有些发抖，他魁梧的军人身躯也更加挺直了。停顿了一会儿，刘白羽又用更深沉的语调接着说道：“我是经历过战争的人，我看到过死亡，看到过牺牲，我们今天的胜利是无数勇敢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我们这套书就可以告诉我们的后人：我们必须爱我们的国家。所以，我说这一套书现在出版有它深刻的意义。我们都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只要是有良知的人，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自己所讲的话，对得起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我们身旁倒下的那些人吗？”刘白羽说得是那样深情，以至于整个北京国际饭店会议厅都变得肃然起来。我当时就觉得，刘白羽真是个卓越的演说家和散文家，真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善于烘托气氛的人。他的这次讲话，虽然只是一次即兴发言，但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充满激情的优秀散文。

刘白羽不仅在讲话时激情澎湃，就是在写书评文章时仍然是激情的书写胜过理性的分析。他在《求是》1989年第15期上发表的《烈火中永生——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报告文学编〉》中同样采用的是散文家的笔调。他开篇就说：“历史，特别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悲壮而又璀璨的历史，不论生活的长河漫漫流到何时、流向何方，它总要发出震撼人心的声音与闪光的。”接着，他就列举了《报告文学编》中一段段“血与火”的描写。然后笔锋一转说：“今天，当我们在改革

大潮中开拓前进时，还是很值得回顾一下民族崛起而兴起的那个时代。那是敌人要我们毁灭与死亡的时代，又是我们从血与火的废墟上奋发飞扬的时代。我常常想：我们中华民族真正是美丽的，因为她是烈火中再生的凤凰。抗战成为从死亡到新生的伟大转折点。今天，我们看到联合国大厦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正面墙上镶嵌着火凤凰的图案。如果说环顾全球，还有多少处熊熊大火在燃烧，我只虔诚地希望：今日熊熊的烈火中必将在明朝翱翔出美丽的凤凰。而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我们正是在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东方飞出的第一只凤凰。现在，玫瑰色的晨光照亮我们建设大军的前进步伐，那么，我们何尝不应该从历史深处汲取强大不息的精神力量。”这样的激情书写，不同于一般的读后感和书评文章，而是真正的抒情散文。这恰恰体现出刘白羽的散文家的特点。

大约在1989年秋天，刘白羽和文艺理论家林默涵到重庆合川游览了抗击蒙军的古战场遗址钓鱼城。回到重庆出版社，刘白羽又满怀感情地说了一段话：“我73岁了。我想，一个人总是要死的，但要看怎样死。一个共产党员在死的一刹那，只要在大的方面无愧于党，我就可以放心而去了。”接着，他还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七绝：“孤城雄峙万重山，砥住胡风卷巨澜。日落日出千古事，不争不斗不能前。”刘白羽借钓鱼城的故事说出了自己坚持斗争的精神。我被他坚定而激昂的情绪所感染，赶紧请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首诗。尽管我觉得他在有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些偏激的因素，但从内心深处来说，我还是佩服和喜欢他这样的感情丰富的人。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出版以后，重庆出版社又准备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专家编选一套《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刘白羽是出版这套丛书的最热情的支持者。在1990年2月，他对重庆出版社的编辑说：“出版《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更有迫切性，意义深远。”在3月8

日的筹备《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的会议上，他又说：“现在，法西斯主义又活跃起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要早一点出，特别是东欧的作品。这实际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贡献，是对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回击。法国作家维尔高的小说《海的沉默》一定要收，不然就被人遗忘了。”

正式确定出版《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以后，重庆出版社准备聘请一位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德高望重的中国作家担任书系总主编。通过反复斟酌比较以后，大家一致觉得刘白羽最合适，因为他不仅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兼副主席、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总政文化部部长、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等职，而且还是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主席，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知名度。我们到刘白羽家里，说明了聘请他担任书系总主编的意思以后，他爽快地答应了。他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过去读过不少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比如海明威的《战地钟声》，斯坦贝克的《月亮下去了》，有的段落我至今还能背诵。我们一定要把这套书编好。”

刘白羽担任书系的总主编不只是挂一个虚名，而是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不仅每次编委扩大会都莅临主持，而且还经常亲自给老将军、老作家、老同志们打电话，邀请他们参加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正是在听取了很多老作家、老同志的建议以后，刘白羽向出版社提出：“中国是反法西斯的重要国家，中国的反法西斯文学也应该收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因此，书系必须增加一个中国卷，否则就是不完整的，是一个缺陷。”当时，这套书系是按照国别来编纂的，共有17卷，40册（其中，苏联卷有10册），规模已经比较大了。如果再增加一个中国卷，出版社在人力上实在安排不过来，因为当时重庆出版社正在编辑一套22卷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刘白羽也是《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的编委，他知道出版社的难处，就说：“那就等《中国解放区

文学书系》出版后再讨论中国卷的出版问题吧。”1992年5月,《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正式推出。1992年6月26日—29日,重庆出版社在北京中纪委招待所召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国卷》工作会议,总主编刘白羽亲自主持了会议。会上,讨论确定了《中国卷》的规模,《中国卷》的编委会,《中国卷》的时限、地域、文学样式等。刘白羽说了三点意见:“一、我认为,《中国卷》不能离开《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这个总题目,反法西斯主要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德、意、日法西斯。不能中国特殊,要有统一的指导思想。题材、体裁在全书的统一指导思想下进行。二、中国反法西斯时间长,作品多,要精选。不要先定10册、12册,一定要坚持精选的原则。我们不能比别人不精练,要比别人精练。《中国卷》可以预计12册,但一定要精选。三、节选不能太多。”刘白羽的意见最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中国卷》的增加和运作,可以说都是在刘白羽的亲自督促和坚持下完成的。这也可以看出刘白羽立足反法西斯全局的深远眼光和循序渐进的务实作风。1994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全部出齐,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一次性推出。当我们抬着一整套《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52册)来到刘白羽在北京饭店的住所时,刘白羽翻着一册册封面银灿灿的书,高兴地说:“好,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能够出来真好。不过,书出来以后,还要加强宣传工作。你们可以给有关领导送一套去,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我也给相关领导写一写信,替你们宣传宣传。”

后来,在刘白羽的指导下,《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的宣传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不仅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闻出版报》、《文艺报》、《文学报》等几十家报刊予以了报道和评论,而且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好评。1995年5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亲笔题词:“殊死搏斗 辉煌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编委扩大会照片

胜利 弘扬正气 荡涤邪恶 激励后代 维护和平”。1995年5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庆典时，把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苏联卷》（10册）作为礼物，送给叶利钦总统，请他转交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收藏。俄罗斯政府则将俄罗斯出版的《朱可夫元帅回忆与思考录》（3册）通过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回赠给重庆出版社，并向重庆出版社颁发俄罗斯联邦卫国战争纪念证书，以表彰重庆出版社筹划并出版了含有10册苏联作家作品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的实绩。由于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1995年获得了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通过这样多次的接触，我比较深切地感受到了刘白羽的感情丰富、热情似火的一面，也感受到了他眼光深远、立场坚定的品质，这些可能

对他成为卓越的散文家有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刘白羽在某些方面有偏激的地方，但对他的坦白直率，对他文学作品中激情和感染力，我还是衷心喜欢和佩服的。

敦厚谦和的文艺理论家林默涵

林默涵是福建武平人，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1938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曾任延安《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编辑，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1949年后他历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第一、二、三届理事及第五、六、七届名誉副主席，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及第六、七届政协常委。著有杂文集《狮和龙》、《浪花》，文艺论集《在激变中》、《林默涵文论集》等。

林默涵长期在文艺界担任领导职务，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但他却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在1987年到1995年，林默涵曾担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的总主编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的顾问。我因参与了这三套“书系”的编辑工作，与林默涵有过十几次接触，也多次听过他的讲话，因而对林默涵的敦厚谦和的性格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有一定的体会。

我第一次见到林默涵大概是在1987年春天。当时，重庆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一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为此，我们专门来到北京三里河林默涵的家中，向他汇报筹备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情况，并想聘请他担任书系的总主编。林默涵是

南方人，中等个儿，国字脸，戴一副眼镜，一看就给人一种文人的印象。他说起话来声音不大，不紧不慢，很有条理，这大概和他长期从事杂文创作和理论研究有关。他听了沈世鸣总编辑的情况介绍和聘请他担任总主编的来意后说：“夏衍和石西民同志提出出版一套大后方文学的丛书的意见是正确的。现在《延安文艺丛书》已经出版，而同样重要的大后方文学资料的整理出版却是一个空白。现在，你们准备用出版教辅赚的钱来出版一套大后方文学的丛书，填补这一空白，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这很好。我一定大力支持。不过，在抗战时期，我主要在解放区生活和工作。我1938年8月就到了延安，在国统区（大后方）生活和工作时间大约只有两三年。抗战初期我曾参加过武汉《全民周刊》的编辑工作，1944年又到重庆《新华日报》编辑副刊。因此，你们最好请其他人来担任总主编。”沈世鸣总编辑说：“关于总主编问题，我们也斟酌、比较过，觉得默涵同志长期在文艺界担任领导职务，了解和熟悉文艺界的情况，自己又是杂文家和文艺理论家，所以是最合适的总主编人选。我们走访老作家时，他们都比较推崇你。众望所归，请默涵同志一定支持。”林默涵最后同意担任总主编，但提出请夏衍和阳翰笙担任总顾问。

在我看来，林默涵提议请夏衍和阳翰笙担任总顾问是有深意的：一是因为夏衍、阳翰笙都是当年长期战斗在大后方的重量级作家，他们担任总顾问可以增加书系编委会的权威性，弥补林默涵在大后方生活时间较少的不足；二是因为夏衍曾在桂林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又曾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而阳翰笙则曾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们分别代表不同地域和不同组织，他们担任总顾问可以增强书系编委会的代表性。因此，这个提议实质上证明了林默涵思维的缜密性。同样，在建立《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的编委会的时候，林默涵又提出请巍巍担任书系的

副总主编，道理也同请夏衍和阳翰笙担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总顾问一样，都是为了增加编委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因为林默涵和巍巍分属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代表了不同的地域。可见，林默涵考虑问题的缜密性和包容性。这种思维特点促进了编委会的和谐，促进了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使得林默涵主编的这两套“书系”赢得了较好的声誉，并分别获得了第四届和第七届中国图书奖。

林默涵这种思维缜密、全面周到的理论家特点在他的其他几次讲话中也体现得比较充分。在1987年6月26日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编纂工作座谈会上，作为书系总主编林默涵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首先表态：“我拥护编这套书。”然后简单谈了谈关于“书系”所收作品的时限和地域的问题。最后，他说：“要很好地完成这一套大书，总主编还不是最重要的，每一编的主编还更重要。”林默涵这段话既体现了他谦和的性格特点，同时也暗含了给各位主编压担子的意思。在1987年12月11日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汇报会上，林默涵还在说：“我参加这项工作，不合适。我到重庆不到一年，抗战就胜利了。后来，我到了香港，香港的文学活动很活跃，但那已是解放战争时期。然而，这件事情很重要。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变成新中国，抗日战争是一个最大的历史转折点。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把这一段的文学作品收集起来意义重大。抗战时的文学，分为大后方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反映的内容很不一样。“解放区文艺丛书”已开始编，我也要参与，要我写序；大后方文学不编，是一个缺陷。编这样的大书系，工作很困难，需要开一个编委会，把编辑方针、原则定下来，作品的内容（抗日、争民主）、所选的作者等等，要订出一个条例。《总序》由夏公写，可以超脱一点，主要谈谈整个文艺运动的概貌，不要太细地谈作品。我只是作这样的建议。我们召开一个编委会议，参加的人可以多一些，包括编选者和出版社的编辑。《总序》问题在编委会上讨论一

下，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林默涵既谈了自己不适合当总编辑，表示谦虚；又说此事的无比重要，不编是一个缺陷；同时，又积极地出谋划策，大力推动编委会的工作；这些都可看出，林默涵的思维是很缜密的，讲话层层推进，具有理论家的思维特点。

同时，林默涵在重大问题或敏感问题上又喜欢多多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择善而行。在选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敏感的或重大的问题。有一次，选编者碰到了几篇有争议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还不是很开放的背景下，需要请总主编拿主意。而总主编林默涵却生病住院了。我们几次去探视，都被医院谢绝。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得到几分钟探视时间，就赶紧把问题提出来。林老说：“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要多找些同志商量才好。”林老出了个主意，第二天趁病员在医院的花园中散步的时间悄悄溜出去，在附近找一个地方开一次特别的编辑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充分发表了意见，最后商定：一定要全面地、历史地、真实地、不存偏见地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的实绩，只要是主张抗战的、赞成民主的、同情人民的作品，并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作者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大陆、台湾或侨居国外，都可以选收。在这种编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所收的作品和作者就非常广泛，既有周恩来、郭沫若、茅盾、老舍、闻一多等的文章，也有张道藩、王平陵、胡秋原、梁实秋等的作品，还有宋美龄、蒋经国的报告文学，得到了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好评。

同样，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封面初步设计出来后，林默涵完全同意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抗日战争浮雕作为封面的图案，但他主张分别打出两份各以暗红色或蓝色为主基调的样稿，带到北京，请编委们发表意见。1988年3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编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举行。编委们讨